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一辑·第十八卷)

[东汉] 桑弘羊

(前 152 年 ~前 80 年)

财政教育思想与《盐铁论》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一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37 - X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6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一辑
[东汉] 桑弘羊财政教育思想与《盐铁论》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 千字

ISBN 7 - 80135 - 737 - X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 26.30 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一辑·第十八卷

[东汉] 桑弘羊财政教育思想与《盐铁论》选读

上 篇

桑弘羊财政教育思想

理财大师桑弘羊	(1)
桑弘羊财政工商管理思想	(13)
(一) 桑弘羊财政调控论的思想基础和政策背景	(14)
(二) 桑弘羊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16)
(三) 桑弘羊调控思想与政策的评价分析	(20)
“本末”之争与教化的地位	(24)
“义利”之争与教化的作用	(25)
“礼法”之争与教化的目的	(27)

下 篇

《盐铁论》选读

本议第一	(33)
复古第六	(46)
非鞅第七	(54)
论儒第十一	(67)

毁学第十八	(77)
褒贤第十九	(85)
相刺第二十	(92)
殊路第二十一	(106)
讼贤第二十二	(112)
遵道第二十三	(117)
论诽第二十四	(122)
孝养第二十五	(129)
刺议第二十六	(135)
利议第二十七	(138)
国疾第二十八	(145)
后刑第三十四	(154)
授时第三十五	(156)
崇礼第三十七	(161)
论勇第五十一	(166)
论功第五十二	(172)
附:《盐铁论》篇章选读	(179)
力耕第二	(179)
通有第三	(181)
错币第四	(183)
禁耕第五	(185)
晁错第八	(186)
刺权第九	(187)
刺复第十	(189)
忧边第十二	(191)
轻重第十四	(192)
未通第十五	(194)
地广第十六	(197)

贫富第十七	(199)
散不足第二十九	(201)
救匱第三十	(206)
箴石第三十一	(207)
除狭第三十二	(208)
疾贪第三十三	(209)
备胡第三十八	(210)
执务第三十九	(212)
能言第四十	(213)
击之第四十二	(214)
结和第四十三	(215)
伐功第四十五	(217)
西域第四十六	(218)
世务第四十七	(219)
和亲第四十八	(221)
繇役第四十九	(222)
险固第五十	(223)
论邹第五十三	(225)
论菑第五十四	(226)
刑德第五十五	(228)
申韩第五十六	(230)
周秦第五十七	(232)
诏圣第五十八	(234)
大论第五十九	(236)
杂论第六十	(238)

上 篇

桑弘羊财政教育思想



理财大师桑弘羊

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前八〇年)出生于洛阳一个工商奴隶主的家庭。他的幼年是在洛阳度过的。洛阳是春秋时期的政治中心,战国以后又成为一个大商业城市。西汉时期洛阳已有五万多户,约三十万人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桑弘羊生活这样的环境里,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对工商奴隶主的种种活动也知道得不少。

公元前一四一年汉武帝刘彻(公元前一五七——前八七年)继承帝位。不久便营建茂陵为死后埋葬的坟墓,并准备设置茂陵邑(今陕西兴平东南),把各地的豪富迁到那里去。桑弘羊一家也在被迁之列。他随家离开洛阳,经长安前往茂陵,到长安时被选入宫充当武帝的侍中(亲随),留了下来。

迁徙豪富,强迫他们离开根深蒂固的老窝,是法家的一贯政策。它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有时还给被迁豪富的子弟以官职,则是一种羁岸办法。武帝当政时的最后一个丞相田(车)千秋,就是汉初被迁的齐国旧贵族田氏的后代,少年时被任为高寝郎。桑弘羊的入宫,也属于这种情况。

侍中是个小官,管理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务。由于是在皇帝左右办事,因此一般豪门富室都羡慕这个官职,都想为自己的子弟谋得这一职位。

汉初以来继续实行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工商奴隶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限制。生活于工商奴隶主家庭的桑弘羊对此不能无所感受。被迫迁徙,对他的震动更大。但是,他到底还年幼,思想没有定型,而担任侍中这样难得的官职,又使他对自已的前途充满着希

望。他同比他年长几岁的武帝朝夕相处,受到武帝法家思想的薰陶和教育。新的环境,不断培育着新的思想。他还在侍奉武帝读书的过程中读了很多书籍和朝廷的档案材料,使他逐渐懂得了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历史。他深刻地感到,商鞅、荀况、韩非、秦始皇等法家的主张和政策是适应形势需要的,只有实行法家路线,才能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随着法家思想在头脑中的牢固树立,终于使桑弘羊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坚定地站到了新兴地主阶级一边。

武帝执政以后,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坚决进行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奴隶制游牧民族。战国时期起,匈奴奴隶主贵族就经常侵扰北边。匈奴擅长骑马射箭,行军迅速,飘忽不定,到处窜犯,防不胜防。当时与匈奴接壤的秦、赵、燕等北方各诸侯国为了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曾各自在边界后方筑起长城,同时积极备战。如赵武灵王为了战胜匈奴,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仿照匈奴服装,练习骑射,自己带头实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抵御外侮的故事之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对付匈奴的侵扰,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屯成北边,并把原各诸侯国所筑的长城连接起来,绵延数千翌,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

汉初,匈奴更加强大。它称霸北方,东灭东胡,占有内兴安岭、辽河上游地区;北败泽瘦、屈射、丁零诸部落,直至贝加尔湖;西方驱走大月(ru肉)氏(zhi支),并征服了楼兰、乌孙等二十多个国家,祁连山、天山一带都归它统治;南面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与西汉北部郡县接壤。匈奴奴隶主贵族还不满足于已占有的辽阔土地,企图侵占汉朝的富饶国上,对汉朝形成极大的威胁。他们为实现扩张的野心,和汉朝国内的分裂、复辟势力勾结在一起,进行颠覆汉王朝的阴谋活动。如燕王卢绾、吴王刘濞发动武装叛乱前,都派人勾结匈奴奴隶主贵族一起出兵;卢绾以及赵王刘遂、韩王信等叛乱失败以后,还投奔匈奴,引它入侵。公元前二〇〇年,汉高祖刘邦在镇

压了得到匈奴支持的韩王信等叛乱以后,曾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入侵的匈奴,但是被匈奴单于(首领)冒顿率精骑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七天,失败而归。力量对比的悬殊,迫使他与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和亲”讲不可靠。尽管汉王朝把宗室女或宫女充作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赠送大批金帛财物,匈奴仍“侵盗亡(无)已”,气焰非常嚣张。每次入侵,都是烧杀掳掠,把大批青壮年拉去当奴隶。

汉初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采取募民屯边的政策,选拔将帅守卫边境,训练士卒,并对运输粮食到边塞交给国家的人给以官爵奖励,积蓄抗匈力量。武帝即位初,西汉的经济已进入繁荣时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城乡粮仓都满,国家财政收入年年有积余。京师钱库里的钱长期不用的有好几亿,穿钱的绳索部烂断了。太仓(京师国家粮仓)的陈粮一年积一年,装不下只好露天堆放,以至霉烂不能吃。马匹也繁殖得很多。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从一个方面说明对匈奴侵扰的战略反击时机已经到来。

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匈奴又来请“和亲”。武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行(接待宾客的官)王恢主战。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韩安国散布失败主义谬论,主和。大臣大多站在韩安国一边。武帝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和亲”。

两年后(元光二年),武帝又下诏问公卿,再次征求对和战的意见。王恢和韩安国继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王恢主战,韩安国主和。最后武帝赞同王恢主战的意见。从此,西汉王朝开始了对匈奴的大举反攻。

决定抗击匈奴的方针后,主和派仍喋喋不休,竭力阻挠这个方针的贯彻。儒家公孙弘早在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出使匈奴时,就因不执行武帝的对匈政策而被罢官。后来地升任御史大夫,又反对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把抗击匈奴说成是“罢(疲)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得不偿失。另一个儒家董仲舒则鼓吹只要给

匈奴单于以厚利,和他对天结盟,并要他送爱子来做质,就能够“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紧急军令)不行于中国”。有个叫狄山的儒生也跳出来宣扬“和亲便”,攻击武帝举兵击匈奴造成了内地空虚、边境贫困的后果。武帝听了他的话,生气地问道:“派你去守一个郡,能不能使匈奴不入侵?”狄山尴尬地回答:“不能。”武帝又问他:“能不能守一个县?”狄山仍回答:“不能。”武帝再问他:“能不能守一个要塞?”狄山知道不能再推辞了,只好硬着头皮说:“能。”武帝真的派他去守一个要塞,到任只有一月多,就被匈奴入侵者砍了头去。武帝巧妙地以事实教训了主和派,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狄山乘(守卫)障(要塞)”的故事。这些人鼓吹“和为贵”,实际上就是要向匈奴人侵者屈膝投降,妄图引狼入室,使封建制度的中国退回到奴隶社会中去。“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

武帝对主和派的种种谬论非常愤怒。他常常将朝廷上的和战之争情况说给桑弘羊听,征求桑弘羊的意见。桑弘羊坚决主张抗战,他说:“汉朝有匈奴的存在,就象木头里有蛀虫存在于样,又好比一个人生了病,不治它就会使病加重。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国之间也常常订立盟约,但从来没有一个盟的是坚固的,更何况是反复无信的匈奴!只有用武力解决,才能使边境的老百姓得到安宁。”武帝很赞赏桑弘羊的话,更加坚定了抗匈的决心。

下面是武帝前期的抗匈斗争形势。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决定抗匈政策后,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村官将军,率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治所在今山西朔县)山谷中。准备诱敌深入,将它围而歼之。因被单于发觉,没有成功。

元光六年,匈奴入侵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怀来东南),杀掠史民。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治所在今河北

蔚县西南),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南),分兵进击。卫青一直打到龙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斩、俘七百人。

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匈奴入侵辽西(治所在今辽宁锦县西),杀太守;入侵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密云西南)、雁门。杀掠三千余人。武帝派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郡,斩、俘数千人。元朔二年,匈奴入侵上谷、渔阳,杀掠千余人。武帝派卫青、李息出云中向西迂回,大破匈奴楼烦王、白羊王的军队,斩、俘数千人,收夏河南地。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议,在这里建立朔方、五原(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二郡,以朔方为防边的重镇。这样就解除了对京师附近的威胁。

元朔三年,匈奴入侵代郡,杀太守;入侵雁门,杀掠千余人。

元朔四年,匈奴入侵代郡、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南)、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东南),杀掠数千人。

元朔五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将军及兵立十余万出朔方击匈奴,斩、俘一万五千人。匈奴又入侵代郡,杀都尉。

元朔六年。卫青率六将军及兵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三千余人。后来又进军匈奴南部边界,获得大胜,斩、俘一万九千人。

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匈奴人侵上谷,杀数百人。

元狩二年,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南),越过焉支山(在今甘肃永昌西)千余里,斩首八千余人。又同公孙敖出北地(治所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塞外二千余里,直捣祁连山,斩、俘三万余人。但匈奴又在东面入侵雁门,杀掠数百人。卫尉张春、郎中令李广出右北平(治所在今辽宁凌源),李广的军队杀敌三千余人。面对西汉天削的凌厉攻势。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了发展。浑邪王杀了休屠王,率四万余人降汉。武帝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称为开属国。原被他们占据的旧地分为武威、酒泉二郡。从此在这一带绝了匈奴人侵之患。切

断了匈奴同西羌的联系。打通了汉朝与西域来往的道路。

元狩三年,匈奴入侵右北平、定襄;杀掠千余人。

元狩四年,武帝对匈奴发动了交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卫青、霍去病各带骑兵五万,后随步兵数十万,分别出定襄、代郡远征,卫青和单于相遇,斩首一五九千人,单于领数百人突围逃走。卫青一直追到滇北阾额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抗爱山南支)才回师。霍去病同匈奴左贤王交战也获大胜,斩、俘七万余人,一直追到狼居胥山(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经过这次大战,匈奴不敢在漠南建立王庭,有十二年没有再来寇边。

从元光二年的“马邑之谋”到元狩四年的大胜,前后共十四年时间。其中最为重要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元狩二年、元狩四年),前后相距八年。西汉王朝统治下的广大劳动人民为夺取抗匈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才换得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一这种牺牲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同时,汉武帝、桑弘羊等法家人物和爱国将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领导和组织了这一正义战争,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下面我们就会知道,桑弘羊对抗匈战争的胜利,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

抗匈战争的胜利是在克服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其中一个重大困难就是战费的不足。连年战争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支出。一除了备战或作战要有充分的粮草、武器、战马供应外,作战胜利后还要对立功的官兵进行赏赐,对归降者进行生活安排。加上其他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武帝初年的财政蓄积消耗得很快。战争开始后的第四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大农令(主管财政经济的长官)郑当时就已经在考虑扩大财源,决定对商人的车船征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建立朔方郡,参加筑城的人有十几万,费用达数千亿钱。元朔六年除战争消耗外,还对有功官兵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黄金一斤值一万钱)。经过这次支出,郑当时向武帝提出报告,说财政收入(包括历年积余)已经耗竭,“犹不足以奉战士”。他建议采

取用钱买爵及赎罪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武帝同意了 this 建议。经议定,设“武功爵”十一级,最低一级值钱十七万,其他各级依次提高,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九级以上专用于奖励军功。

征车船税和设“武功爵”对增加财政收入虽不无小补,但犹如杯水车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的顺胜利和浑邪王率众来降,战争、赏赐及安置等费共一百余亿钱。同时几处水利建设工程在进行,历年费用又各达十亿多钱。财政更加困难。郑当时对理财不仅没有才能,而且也缺乏兴趣。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这一年虽勉强应付过去,但第二年财政仍然很困难。

在武帝为财政困难而忧虑的时候,桑弘羊的思想也很不平静。他很想为抗匈战争出一把力。他深深懂得,不管财政的困难多么严重,抗匈战争总是要坚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以致前功尽弃。而财政问题如果得不到彻底解决,庞大的战费没有着落,就会拖战争的后腿,使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保证。他知道武帝的决心很大;即使在筹措战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在计划一次对匈奴的更大规模的战役。必须及时解决财政困难才能使武帝无后顾之忧、增强战争的有利形势。他反复考虑了理财的办法,一方面认真研究当时的现实斗争情况,一方面又从前辈法家思想中吸取养料。于是,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第一个指导思想是:解决财政问题。也必须贯彻法家的路线和政策讲根据现实情况加以发展。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法家的个突出经济思想、是重视包括家庭纺织业在内的农业的发展。先秦法家提出农战方针;以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的富国强兵的要求。西汉法家如贾谊、晁错,也很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搞好农业必须实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归纳起来、桑弘羊以前的法家发展农业的政策主要有:废除井田制,发展和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增加农业人口,限制兼并活

动,减轻农业税,提高粮食价格,奖励交粮食给国家(买官或赎罪)的人,兴修水利,改革农具,改进生产技术,移民垦荒,等等。桑弘羊认为这些政策都很重要,应该继续推行。但仅单靠这些还解决不了当前的财政困难,还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法家还主张抑商。抑商的目的既是为了打击工商奴隶主复辟势力,也是为了巩固自给自足的满然经济,并保证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抑商不是不要商。秦孝公时,商鞅在抑商的同时,又“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使“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做到“不赋百姓而师以贍(战费充足)”。汉文帝五年(公元前一七五年)贾谊指出,国家掌握货币。“钱轻(购买力低)则以木敛之,重(购买力高)则以术散之”。可以使物价得到平衡,用掌握的货币来控制商品流通,“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羨(有余)可以使朝廷”富实际末民(工商奴隶主)困。商鞅的实践和贾谊的论述,都说明抑商和利用商业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两者并不矛盾。

使桑弘羊感到极大兴趣的是总名为《管子·轻重》的一些著作。它集中论论述了国家经营工商业以控制商品。货币流通,打击工商奴隶主的兼并活动,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理论。桑弘羊觉得许多地方写得过于夸张。如果照着它做会造成不好的后果胆从中可以得到启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管子·轻重》作者用商品的数量多少来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认为“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贱),聚则重(贵)”。根据这一原理,国家可以借助于国君的“号令”来改变商品的轻重关系。使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例如国君不命令征货币赋税,农民要卖出粮食换取货币,市场上粮食供应增加,多则贱,粮食价格下跌。征敛的期限越短。农民出卖粮食的时间越急,粮食跌价也越厉害。国家可以利用这种影响商品价格的能力,注意控制货币和粮食、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官山海”(盐铁官营)等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政策,就能调节市场,平衡物价。打击商人的兼并活动,防止农民破产.而又获得

巨额的商业利润,做到“不籍而赡国”。就是说,不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而能充裕国家的财政收入。

《管子·轻重》作者认为货币是“民之通货”,即流通手段。它虽然“握之则非有补于暖”。“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但却是“先王”用来“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的重要工具。如果国君不注意如何掌握这个工具。那么即使“强本(农)趣(促)耕”,铸币不停,生产出来的粮食和铸造出来的货币,也只能被用作“民下相役”的手段,巩固不了封建统治。反之,如果国君运用粮食和货币来控制商品流通,那就“天下可定”。

《管子·轻重》作者还把轻重理论运用到对外关系方面。他认为光是“强本节用”还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因为生产出来的粮食可能被邻国用高价吸走,使这个国家不能维持独立。强本以后,还要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单位货币购买的粮食多)我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还举了一些单纯用商战取胜的事例。这种经济理论,叫做“轻重之数”或者“以轻重御天下之道”。

《管子·轻重》的这些论点被秦弘羊所吸收,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他认为用商业利润来解决财政困难,是很快就能见效的好办法。《管子·轻重》夸大了流通过程的作用,这对桑弘羊也有影响。但桑弘羊主要是吸收了它的合理部分。

桑弘羊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再在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体系。桑弘学是先秦至西汉法家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这是后话。

第二个指导思想是:以进一步打击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豪强为政策的重点,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进一步打击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豪强,是西汉王朝建立以来同复辟、分裂势力进行长期斗争的继续。

汉高祖先后分封了一批功臣和子侄为王侯。高祖在世时,就削

平了异性王的叛乱。后来同姓王势力逐步壮大,又成为巩固中央集权的障碍。以高祖的侄子吴王刘濞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把自己所控制的地区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网罗儒生和亡命之徒作为死党,交给其他王侯和地方豪强,收买在朝官吏作为耳目,以小恩小惠收买民心,准备伺机夺取政权。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刘濞联络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国实行武装叛乱(即吴楚七国之乱),自立为东帝。景帝迅速镇压了这次叛乱。武帝即位后,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法,命令诸侯王得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的封地逐渐变小,势力逐步减弱。但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仍蠢蠢欲动。刘安仿效吕不韦,豢养一批儒生,编写了一部《淮南鸿烈》(《淮南子》),为他大造篡权舆论。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刘安、刘赐的叛乱阴谋败露,武帝坚决地予以镇压。

阴谋叛乱的诸侯王是地方豪强和工商奴隶主政治上的代表。他们本身就是豪强或兼有大工商奴隶主的身份。那些一般地方豪强要“武断于乡曲”,希望维持分裂割据局面,在中央政权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往往站在叛乱诸侯王的一边。那些工商奴隶主要恢复失去的天堂,则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诸侯王的叛乱上。

西汉前期,工商奴隶主利用商品生产这块土壤,通过某些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迅速发展起来。

他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市场,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如楚汉战争时期,那些粮食投机商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粮食供应不足,垄断粮食买卖,哄抬粮价,使米每石上涨到五千或一万钱,以致“人相食,死者过半”。有一个叫任氏的粮食投机商“以此起富,成为暴发户”。

他们“管山海之利”,垄断重要生活、生产资料盐、铁的生产和流通,“以致富业”。著名的大盐、铁商卓氏、程郑、孔氏、邴(丙)氏、刁间、师史等,有的“致富数千金”,有的“富至巨万”,有的“田池射猪之乐,拟于人君”。